

此时无声胜有声

——漫忆黄裳与巴金的交往

陆正伟

2021年10月18日，我在徐汇区旅游公共服务中心展出的《薪传：鲁迅与巴金图片展》上，看到自己拍的巴老在鲁迅先生墓前敬献的花篮的图片，不禁想起二十多年前黄裳先生为拙作《世纪巴金》作后记的情景……

2000年初夏，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为贺巴老九十六岁华诞，准备出一本名为“世纪巴金”的书。一天，我来到陕南黄裳寓所邀请他为书作后记。黄裳见是介绍巴老生平的摄影集，当即答应了。也许是看到画册“鲁迅是吾师”一章中有巴老、黄源与他结伴同行访问鲁迅故乡等的配图，他便以此作背景，写下了《琥珀色的绍兴酒》这篇后记，以数百字篇幅记叙了他在绍兴的所见所闻。后记把参观鲁迅先生故居百草园，及接受故居纪念馆赠送鲁迅先生惯用的“金不换”毛笔等难忘场景和细节悉数收入内文。那天，三老还为纪念馆题词留念，巴老题怀念鲁迅的词；黄源是忆先生的，各有所长。黄裳题的是：“鲁迅先生永远是我学习的楷模，愿追随先生的脚步前进，这是我毕生的志趣。1983年10月9日。”

然后，他们来到故居对面，过了屋前的那座石板小桥，走进“三味书屋”。在鲁迅儿时读书的座位，巴老侧身挤进狭小的书桌，坐在先生当年的椅子上开心地笑了。

午饭时主人取出了存放几十年的绍兴陈酒，只有一小瓶，座中每人都分到一小杯，那确是难得的陈酿，已经成了琥珀颜色的了。

黄裳借物抒情，在平直的叙述中表达了几位鲁迅追随者的敬仰之情。小林读后说，黄裳的这篇后记写得真好。

没隔多久，《世纪巴金》出版了，出版社拿出三十本书，请为书作序和跋的作者签名盖章进行义拍，拍得款捐给“希望工程”。那天，我们把书运抵黄裳寓所，我拿着黄裳坐在沙发上边签边翻看着书中一幅幅熟悉的图片，便与他东拉西扯地攀谈。当我问及巴老替他找回失散多年的书时，黄裳见我似知非知，便告诉我——

一次，黄裳约上黄宗江和姜德明上巴金寓所喝茶聊天。彼此谈得正酣时，巴老上二楼找出三本藏书送黄裳，说是二十多年前托人从旧书店买的，现在没用了。黄裳见其中一本《药味集》扉页上有周作人亲笔为他题的字。还有一首“题诗”仍夹在书页中。黄裳和我说到书上的签名及诗的来历。1946年，时为文汇报记者

的黄裳，到南京的老虎桥监狱采访被羁押的汉奸文人周作人。访谈结束，黄裳拿出《药味集》让他签名，周作人不仅签了，还另给黄裳作小诗一首。黄裳还记得，此书是在他被打成“右派”后从家里“流”出去的，却在不经意间回到自己的手中。

1997年11月20日，我走进巴老病房，听见巴老正在动员黄裳捐书。他对黄裳说，你可捐些书给上海图书馆。黄裳说，准备捐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巴老立即说，那不一样，你的古籍版本适合给上海图书馆……

正在讨论时，柯灵夫妇开门走了进来。柯灵还是那熟悉的笑脸，进门与大家招手并点头示意，我还特意转向黄裳点了点头，黄裳与其相视抿嘴一笑。柯灵夫妇便在巴老的另侧落座。此时病房里的气氛明显没有先前那么轻松随意了，大家不知从何处说起。过了片刻，还是巴老先开了口，问柯灵近来在忙点啥。柯灵说正在写浙江文学志和准备赴京参加民主党派会议。接下来，他们都似王顾左右而言他，不知所云。在场的我心里都清楚发生在三年前的那场笔战，使柯灵与黄裳已有多时未相见了。如按往常，我早就给他们合上影了，这次却始终没敢举起手中的相机，生怕造成遗憾。

原来，1994年适逢梅兰芳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柯灵在《读书》（第六期）上发表了《想起梅兰芳》的文章，对黄裳写于1947年的《钱梅兰芳》提出了不同看法。随后黄裳在《文汇报》（1994年7月）回应以《关于〈钱梅兰芳〉》一文。在以后的一个多月里，双方在报刊上打起了“笔仗”。你来我往，各不相让。相比之下，柯灵的文章犀利，而黄裳则从容不迫，在我眼里都是论辩的好文章，属正常学术范围内的争论。三年后，两位名闻遐迩的散文大家，又同为文汇报的资深报人，在探望巴老时巧遇，能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相逢一笑，实属不易。这当然离不开巴老的桥梁作用。难怪他们告辞离去后，巴老坐在轮椅上“偷着乐”，小林见他这么开心就问道：“爸爸你在笑什么？”他说：“我刚才差点笑出声来。”后来，有友人为我未拍下一幅巴老与黄裳、柯灵的合影而惋惜，现在想想当初我的顾虑确是多余的。

2002年9月27日，我随巴老的胞弟李济生、侄子李致、女儿李小林、侄女李国糕到浙江嘉兴路访李氏祖籍地，到访“仰甘亭”、塘汇镇西的李家

祠堂旧址，在返回的路上顺道来到南湖湖心岛上的烟雨楼小憩。小林是重返旧地，她给我们说起四十多年前她与弟弟小棠随父母到嘉兴游玩的情景。1955年，黄裳与嘉兴卫校读书的朱光耀姑娘正处于热恋期。一天，他约巴金、萧珊夫妇带着儿女赴嘉兴，泛舟南湖后上烟雨楼喝茶，黄裳有意让未婚妻来与大家见见面，“亮相”。巧的是，我来嘉兴前在《文汇报》“笔会”上刚读到黄裳对烟雨楼赞美有加的散文《嘉兴去来》，我不曾想到其中还有这么一段充满故事的小插曲。

回上海后不久，我在翻阅《巴金全集》的“书信卷”和《家书》时看到这段爱情故事。“前奏曲”已被巴老记录在册。抗美援朝时，在朝鲜体验生活的巴金读到妻子萧珊的来信，其中说：“有一天黄裳陪那位小姐来我这儿坐了许久，第二天就去无锡，我们在报上读到他们订婚的消息。”（见《家书》1953年11月16日的信）巴金看后即提笔写信给黄裳：“蕴珍（即萧珊——作者注）来信也说起你订婚的事。这是好消息。什么时候结婚？我希望能喝一杯喜酒。”（见《巴金全集》第二十四卷370页）

黄裳对在人生道路上得到巴老的祝福是矢志不忘的。1942年冬，黄

裳拿着巴金的三哥、他的英语老师李尧林的一纸便条，只身入蜀，去找巴金。见面后，他对巴金的印象是说话不多，待人却很热情。巴金把黄裳视同手足，见他举目无亲，生活困难，便帮助把他的旅行记事散文介绍给《旅行杂志》，使黄裳在重庆得到了第一笔稿费。黄裳在军中任翻译官时常调防，巴金把他曾发表过的散文收集到一起，通过书信与黄裳商议进行编排修改，为他出版了第一本书《锦帆集》。由此，黄裳走上了文坛。

我在黄裳的怀念文章中看到，有一次单位搞个人鉴定，黄裳请巴老给他提意见，巴老向他指出“拼命要钱”是大缺点（见《散文海外版》2006.1期）。黄裳对巴老的批评意见心悦诚服。他因喜欢买旧书，感到钱总是不够用，于是预支版税，计算稿费，编书也要编辑费，用他的话说就是无所不用其极。可见巴老对他所提的意见说是的真话。

我与黄裳的接触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虽然也时常看到他到作协开会或参加各种活动，但多数还是在他探望巴老时见到的。我从他们的交往中观察到巴老对黄裳的关爱是无微不至的。早些时，巴老常以书信或带话的方式约黄裳到家里品茗聊天，他珍视这样的轻松自如的交谈。有

2021.12.8
2022.8.20 定稿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黄裳、茹志娟、吴强、王安忆（后排自右至左）与巴金合影

虽然三十年前曾在淮海中路622弄7号蛰居了三年，但是隐身期间却很少去旧上海老城厢老西门转转。只有一次不知为何偶然路过那里，还在一家狭小的书店里见到了薛华先生的《哈贝马斯的高谈伦理学》，虽然我此前已经从图书馆借读过这书，却还是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从此，在我的记忆中，老西门就与这次难忘的淘书经历联系在一起。

昨天一早进城办事，从沈杜公路坐8号线刚好是老西门下。近四十分钟后，从地铁站出来，秋日的暖阳下，只见清一色的高楼大厦，当年那低矮逼仄的印象已与眼前的情景完全对不上号。我与自己的学生Z君，先是步行到附近的普安路办事，上蹲下跳，等一切停当，已经是十点多钟。凭着我从三十年前那三年所形成的方位感，我们决定从西藏南路步行到福州路文化街去——反正来沪后不多的几次进城，都没有不到福州路的。

因为西藏路上的隔离带，我们师徒两个“乡人”就先逆行了一段，再翻过延安路上的天桥跨到西藏路东侧顺行。站在天桥上朝西望去，就是从上海市内的交通大动脉延安路高架上下来的车流；望着这车流，我想起的是二十年前在丽娃河畔参加会议，主办方安排代表们到其时刚落成不久的新天地参观，我与在那次会议上初见的陈教授挤坐在大巴的同一排上，陈教授发出的那句感慨。而我的学生Z君本来是学与陈教授相近的土木专业出身的，在走下天桥时，一向少言寡语的他竟忽然忆起当年大学教学实习时，带队的老师对他们现场讲解高架桥结构的往事。

过了天桥继续前行，就是工人文化宫了，看到那熟悉的陈年形制，不禁让我想起1990年秋冬时节的一个夜晚，我在此地举办的文汇报上买到《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先生译本，走出会场时西藏中路上那璀璨的灯火仿佛还在我眼前，而转眼间那竟已经是三十二年前的事了。想到这里，我稍微调整了一下身姿，就在工人文化宫前开始摆拍，Z君灵机一动，想出了广角摄像的妙招，果然，在这样的“视域”下，我的形象自然也就

条头糕的再会

应奇

“伟岸”了起来——这大概也要算是智能时代的一种“人体增强”了吧！

继续前行一会儿，就到了福州路口。虽然我已经很久没有来这里了，但是疫情之后的福州路似乎真的冷清了不少。想起前次上海书城歇业大甩卖时大厦内人头攒动的情形，确有恍如隔世之感。上海人喜欢捡便宜，此话不假，虽然打折买书乃是不折不扣的理性行为，不是么，上海人确实是很精明，记得那次我是兴冲冲地还有点儿自作聪明地从闲逛赶到书城后就直奔影像部，本想趁此机会入手些CD，但是一进入场地，可能是我那种捡便宜的兴奋劲儿太明显地写在了脸上，在我东摸西摸不久，就有一个几乎是正装——毕竟是卖古典CD的伙计——的中年男走到我眼前，正色道：CD不打折的！不过“乡下人”并没有被此话吓到和击倒，而是照样从容地挑出了千把元的CD，当然内容还是很大众，不外乎就是贝多芬、勃拉姆斯、马勒之类。

除了那次的淘碟行动，书城的存在对我几乎不重要，因为福州路对我的意义就是旧书街，虽然旧书店早就缩水到快要消失了——刚重返沪上不久，我独自去上海之巅观光，回来打车到福州路去，出延安路隧道后右拐就是福建中路，就在快到福州路时忽然发现右手有一家旧书店，就马上叫停了出租车。这家店空间狭小局促，一股没落的气息扑面而来，让人微微有点儿心酸，但这又是谁都无法如何的事。如今既然又来了福州路，我就想起再到那里去看看，但是走到近前，却发现那家店已不在，还记得当年在那店旁是一家与鲁迅的集子同名的名为HOT WIND的小店，也已经全踪影了，我们就只好回到福州路上继续往前走。

前面不远处就是上海图书公司，大概因为疫情，书店的玻璃门是闭着的，需要推门后扫场码才能进店，而我却一时未能推开门，看到旁边还有一道门，就前行两步去推那道门，门是推开了，场码当然也是要扫的，进了门才发现这是一家旧书店，迎上来的是位应该比我还年长的老太。就是在她的目光注视下——因为店内空无一人——我们开始了“扫荡”。在翻过了一会儿书架后，我终于没有忍住问那位老者：你们这店是从福建中路上搬过来的吧？在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我才在正对门到底的书架上发现了陈乃乾编的那套《清名家词》上海书店重印本，在这家店还在福建中路上时，我就抚摸而未下单这套书，正如我还记得那年在七宝的那家旧书店书架上有《六十种曲》，也是我犹豫半晌而终于轻轻放过的。

毕竟距离上次逛此店已有数年，书店里还是有些此前未见的品种，前前后后选出了数十种我在别处所谓的“小旧书”，我选这类书，最高的不会超过一百元，多数是五十元以下的。除了多种书目，如《丛书集成初编目录》（四部丛刊初编三编目录）《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我还选了同样是上海书影印的《语丝》和《奔流丛刊》，书架上还有一套《食货》，标价二千五百元，不过我已经有这个影印版的重印本了，正如书架上那部横排精装的标价二百的《邵元冲日记》，我也已经有它的三卷平装重排本了——很多时候，我还是只能克制一下自己的所谓初版癖，不是么？

我选的书，最有特色也让我花了些价钱的是一套Modern Library版的Renaissance in Italy，洋红布面精装上下册。我本来就很少出洋，疫情

和我近年的个人生涯规划更是决定了我在最近几年不可能有“长期”出洋的计划，这一切似乎让我对这套如果放在纽约的旧书店里一定会便宜得多的书格外“珍视”了起来。

见到我挑出的那些书，那位老者一开始误以为我是自己开书店的，意思就是买进这些书是准备再次去卖出的——这种“奇遇”至少已经是第二次了，上次在嘉定，那家书店的老板也似乎略有此疑——面对如此有喜感的“美丽误会”，我倒是并未“将错就错”；而老者似乎也开始辨认出些我的选书品位，于是热情地向我推荐起书来。虽然她推荐的书籍基本上是我不要的，但是上海书店自己办的《博古》还有一种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古旧书刊》，我还是选出了几期留作纪念。我所选出的两期书，一期中有篇介绍陈垣和《渔山剩稿》的，另一期中有篇介绍谢国桢和《两当轩集》版本的。薄薄的小册，单价要二十五元，我抱憾价格定太高，老者就用沪语对我说“麦斯好呀”（东西好的意思），我也只好感叹“奇货可居”了事。

翻到一本莫斯科外文书籍出版社的《国家与革命》，应该说只是白菜价——在这里见到莫斯科版，当然不免让人有所联想，因为一位我过去的同事前些年就曾闹过一个引用莫斯科版的乌龙。还有一种大字本的《法兰西内战》，完整的函套尚存，只要三十五元。以前在图书馆和旧书店见过的所谓大字本都是古籍，例如王船山的《读通鉴论》之属，革命导师经典著作的大字本，恕我孤陋，可能还真的只是初见。

在我挑书时，同行的Z君在偶尔自己选书的同时似乎也在帮我选书，如同那年在海岱山的S君和L君，Z君还真帮我选出两种书，一是《匈牙利

一次，在杭州养病的巴老托我带两盒西湖龙井回上海，说黄裳喜欢喝茶，让他也尝尝新。黄裳夫人逝世，在告别仪式上，黄裳发现一只挽联上署名“老友巴金”的花圈。令黄裳动容的是巴老住医院也有好几年了，心里仍惦记着他。

平时，多日不见，如隔三秋，两人期盼着相见。真的在一起了，巴老因病无力气说话，又碰上黄裳少言寡语，对话不多。我看到他们时常会有“卡壳”的状况，坐在那你看我，我看看你。每当此时，我便想起白居易的诗句“此时无声胜有声”……

出几本书，送送朋友，是巴老生活中的一大乐趣。因此，无论单行本还是大部头的全集、选集及五卷本的《随想录》都会送给黄裳。有几次黄裳来访，巴老都会叫我从柜子里帮他拿新书，当场签名送给黄裳留念。有了书作话题，巴老与黄裳的谈话就流畅得多，自然而然像泉水般流淌出来。

1998年11月16日的那次见面，黄裳进门还没坐定，巴老就对他叹起了苦经，说：“我现在动不了了，书店没法去了。”黄裳说：“我也已多年没去四马路（即福州路）书店了。”巴老笑着说：“以前，书搬来搬去，我高兴搬，现在连书都拿不起了。”接着，他告诉黄裳说，这次出了一套《巴金译文全集》，这可能是他的最后一部书了。黄裳听后说道：台湾出版的那套译文全集漂亮。小林说：“这次把克鲁泡特金的作品也收进去了……”

黄裳与巴金长达六十多年的交往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我记得，黄裳在一次回望与巴老亦师亦友的交往时，深有感触地称他是新生生的保护者，前进道路上的领路人。如是评说，我看是恰如其分的。

寻行数墨

韩羽
庄子的眼神儿更好

《庄子》中有“留动而生物”一语。这“物”与老子所说的“道”当是一个意思，用现下的话说是天地万物生成之本原。

看来庄子比老子的眼神儿更好。老子看到的那个“物”不很分明，是“恍兮惚兮”。庄子看到的就真切得多，那个“物”，既留（静）又动，而且“其卒无尾，其始无首”。

扑哧一笑

翻看《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至《仙人岛》，扑哧一笑。有书生王勉者，与一女有私，“前阴尽肿”，“数日不瘳，忧闷寡欢，芳云（其妻）知意，亦不闻讯，但凝视之，秋水盈盈，朗若曜星。王曰：‘聊所谓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语出《孟子》，全句为‘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

“瞭子眸焉”一语，使之最尴尬者莫过于王勉。可是张三患感冒，李四打起喷嚏来——且看芳云说了这话之后，“但评”（但明伦评本）：“语亦巧合，特嫌其侮。”这位先生刚点了点头，随即又皱起了眉头。“冯评”（冯镇彦评本）：“真是以文为戏，口孽哉，聊告恶息，当以为戒。”气急败坏成了这个样子。

“瞭子眸焉”既逗人笑又惹人恼。蒲翁只注“眸”字：“‘没有’之‘没’，俗读似‘眸’。”“瞭子”付之阙如。何谓“瞭子”？瞭是一句山东土话，《水浒传》里的武松看到景阳冈下的大树上写的“大虫伤人”的字样后，笑道：“我怕怕什么鸟！”武松说的“鸟”，就是这儿说的“瞭子”。如再直白些，再转个弯儿说，在夏天里，农村里的小男孩喜欢脱光屁股，老太太哄小孩穿上裤子，总吓唬说：“快穿上裤裤，老鼠要咬小鸡鸡了。”“瞭子”就是老太太说的“老鼠要咬”的物儿。

与其说蒲翁是个风趣的老头儿，毋宁说是个嘎老头儿。“子不语：怪、力、乱、神。”圣人语鬼怪，蒲老先生偏偏“爱听秋坟鬼唱时”。

这一回在《仙人岛》又把亚圣孟夫子拉扯进来了，将“眸子瞭焉”颠倒成了“瞭子眸焉”，又“巧”又“侮”，将不知孟夫子欲笑还休，还是欲休还笑？

想了想，又扑哧一笑，蒲翁也未必料到，在他身后，《仙人岛》故事里又有了故事，两位道学先生闯了进来，在女人闺房里急赤白脸一惊一乍，只是因了一个“老鼠要咬”的物儿。

「文汇报」
微信公众号
QR code

壬寅年八月廿九凌晨，
涂毕于闵大荒